

【历史研究】

“诸葛之成规”与蜀汉兴亡

张仲胤 张旭华

摘要:“诸葛之成规”是诸葛亮治理蜀汉的基本政策,也是蜀汉政权得以维持的政治基础。其核心内涵是“官中府中俱为一体”,以士人统领官中、府中取代宦官、外戚在官中的地位。“诸葛之成规”既是承接东汉中期以后士人政治理想,也是刘备、诸葛亮反思汉末政治的结果。在诸葛亮、蒋琬、董允、费祎相继离世后,后主逐渐放弃了“诸葛之成规”,并以宦官、外戚、东官旧臣统领蜀汉政权,打破了蜀汉政权得以维持的政治基础,最终导致蜀汉灭亡。

关键词:诸葛之成规;蜀汉;官中府中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0)05-0126-06

三国时期,蜀汉政治号为清平,而其却最先灭亡,令人费解。对于这一问题,现代学者或是从政治、经济、思想、礼制等各个方面进行综合研究,^①或是运用政治、地域集团理论进行分析。^②其实,在蜀汉灭亡后不久,陈寿便将蜀汉倾覆归结为黄皓弄权,“(陈)祗死后,(黄)皓从黄门令为中常侍、奉车都尉,操弄威柄,终至覆国”^③。陈寿身为汉臣,亲历亡国,其所言必有所据,故这一观点影响很大,常璩在《华阳国志》中曾推演此观点道:“(费)祎当国功名略与蒋琬比。”“承诸葛之成规,因循不革,故能邦家和一。自祎歿后,阉宦秉权”,“政刑失措矣”。^④常璩指出蜀汉由盛转衰的节点在“费祎歿后”,而转折的关键是蜀汉政权放弃了“诸葛之成规”。那么,保障蜀汉安定的“诸葛之成规”究竟是什么?其渊源何在?其与“阉宦秉权”有何关系?陈寿所言黄皓“操弄威柄,终至覆国”的观点是否如现代学者所说有夸大之嫌?^⑤还是有更深层次的内涵?

一、“诸葛之成规”的内涵与渊源

建兴五年(227),诸葛亮出师北伐,临行所上的《出师表》,可视为诸葛亮对蜀汉政治的全局性安

排,^⑥其中“官中府中俱为一体”^⑦正点出“诸葛之成规”的内涵所在。“宫府”含义,据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宫府”条:“‘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案‘府’者,即三公之府,见前《汉书》;‘宫中’者,黄门常侍也。”“时虽以攸之、祎、允分治宫中正令,犹恐后主柔暗,或有所暱,故首以此为言。”^⑧

章武三年(223),刘备崩于永安宫,诸葛亮以丞相录尚书事辅政、开府治事,史称“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⑨,蜀汉的政事中心实际在诸葛亮的丞相府。诸葛亮在成都则亲理政事,出师时,则将政事委以留府长史。建兴三年,诸葛亮征讨南中,以向朗为丞相长史主政成都,“丞相亮南征,朗留统后事”^⑩。建兴五年,诸葛亮出师北伐,以陈震为尚书令,张裔为留府长史,蒋琬为参军,共同掌管成都政务,“五年,亮住汉中,琬与长史张裔统留府事”^⑪。又《华阳国志》:“(建兴五年)以尚书南阳陈震为尚书令,治中张裔为留府长史,与参军蒋公琰知居府事。”^⑫建兴八年,张裔病卒,蒋琬继任长史,掌管政事,“八年,代裔为长史,加抚军将军。亮数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给”^⑬。

收稿日期:2019-10-12

作者简介:张仲胤,男,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南京 210023);

张旭华,男,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郑州 450001)。

从史料记载来看,成都政事不仅在于府中,还在于宫中。建兴十二年,诸葛亮薨于五丈原,杨仪、魏延不和,互表谋反,“(魏)延、(杨)仪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后主惶惑不安,其所垂问者不仅有留府长史蒋琬,还有侍中董允,“后主以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⑭。后主问计蒋琬,在于蒋琬为留府长史统领丞相府中事务。而垂问董允,则在于董允以侍中、领虎贲中郎将的身份,统领宫中政事、宿卫,《三国志·蜀书·董允传》:“(诸葛亮)寻请(费)祗为参军,(董)允迁为侍中,领虎贲中郎将,统宿卫亲兵。”^⑮董允在宫中权力很大,史称“献纳之任,允皆专之矣”,“处事为防制,甚尽匡救之理”,以致“后主益严惮之”,“(黄)皓畏允,不敢为非”^⑯。

董允、郭攸之以侍中、虎贲中郎将统领宫中政务、宿卫,实际上是代替了中常侍、小黄门、中黄门冗从仆射等宦官在东汉宫廷中的地位。东汉中期以后,例由中常侍、小黄门沟通皇帝与外朝官员,《后汉书·朱穆传》:“臣闻汉家旧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书事,黄门侍郎一人,传发书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称制,不接公卿,乃以阉人为常侍,小黄门通命两宫。”^⑰东汉宫中宿卫^⑱,由光禄勋、卫尉统领,“卫尉,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宫门卫士,宫中徼循事”^⑲。又“光禄勋,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宿卫宫殿门户,典谒署郎更直执戟,宿卫门户,考其德行而进退之”^⑳。而禁中防卫则由宦官担任,“中黄门冗从仆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黄门冗从。居则宿卫,直守门户;出则骑从,夹乘羽车”^㉑。而蜀汉宫中、禁中宿卫均由士人统领,董允以虎贲中郎将统领“宿卫亲兵”,向宠为中领军“典宿卫兵”。^㉒

董允、郭攸之统领宫中事务,张裔、蒋琬统领府中事务,二者统归于诸葛亮的政治安排,即为“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其实,稍作追溯,则会发现以士人^㉓取代宦官的政治架构,并非出于诸葛亮,而是渊源有自。^㉔以士人代替宦官统领宫廷,是东汉中期以后士人的普遍政治理想,其渊源可以上溯至朱穆的上疏,《后汉书·朱穆传》:“穆既深疾宦官,及在台阁,旦夕共事,志欲除之。乃上疏曰:案汉故事,中常侍参选士人。建武以后,乃悉用宦者。”“愚臣以为可悉罢省,遵复往初,率由旧章,更选海内清淳之士,明达国体者,以补其处。”^㉕其后,何进在密谋诛除宦官前,也曾向太后建议“请尽诛诸常侍以下,选三署

郎入守宦官庐”^㉖。而这一政治理想的实践,则在献帝即位之初,“初令侍中、给事黄门侍郎员各六人。赐公卿以下至黄门侍郎家一人为郎,以补宦官所领诸署,侍于殿上”^㉗。

士人最疾恶宦官之处在于其干扰选举、祸乱地方,^㉘而这二者之间又有很大关联。宦官干涉选举,任用私人屡见记载,《后汉书·杨震传》:“帝舅大鸿胪耿宝荐中常侍李闰兄于震,震不从。宝乃自往候震曰:‘李常侍国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宝唯传上意耳。’”^㉙又《后汉书·史弼传》:“迁河东太守,被一切诏书当举孝廉。弼知多权贵请托,乃豫敕断绝书属。中常侍侯览果遣诸生赍书请之。”^㉚宦官干涉选举的结果是:“(宦官)父兄子弟皆为公卿列校、牧守令长,布满天下。”^㉛而宦官所用之人率多贪残放滥、为祸地方,“兄弟姻戚皆宰州临郡,辜较百姓,与盗贼无异”^㉜。“(宦官)子弟亲戚,并荷荣任,故放滥骄溢,莫能禁御。凶狡无行之徒,媚以求官,恃势怙宠之辈,渔食百姓,穷破天下,空竭小人。”^㉝

宦官干涉选举则使士人仕进路断,招致士人不满,任用父兄子弟,“凶狡无行之徒”剥割百姓,其根源在宦官接近皇帝、受到皇帝信任。对此士人早有认识,李固称:“而中常侍在日月之侧,形执振天下。”^㉞鉴于此,东汉士人溯本清源,在制度上,要求罢遣宦官代之以儒生,在选举上,要求选贤与能黜退宦官宗族、党羽。

而诸葛亮的政治实践正承接这一政治理想,其在制度上以士人控制宫廷政务、宿卫以取代宦官的位置,实现了“宫府一体”。选举上,诸葛亮则在调和新人、旧人矛盾的基础上,务尽选贤与能:“始(杨)洪为李严功曹,严未去至犍为而洪已为蜀郡。洪迎门下书佐何祗,有才策功幹,举郡吏,数年为广汉太守,时洪亦尚在蜀郡。是以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㉟《华阳国志》亦言:“辟尚书郎蒋琬及广汉李邵、巴西马勋为掾,南阳宗预为主簿,皆德举也;秦宓为别驾,犍为五梁为功曹,梓潼杜微为主簿,皆州俊彦也。而江夏费祗、南郡董允、郭攸之始为侍郎,赞扬日月。”^㊱在选贤与能的基础上,诸葛亮又执法公正,使得上行下效,蜀汉政治号为“清平”,故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诸葛亮道:“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讎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

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③⑦}

诸葛亮曾规谏后主:“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③⑧}从中可以看到“诸葛之成规”的实质是对东汉中期以后士人政治理想的实践,其核心是在制度上实现“宫府一体”,在选官上实现选贤与能,在执法上力求“用心平而劝戒明”,在处理政治问题上,努力调和新人、旧人矛盾。以此来纠正东汉中期以来政治上的弊病,调和蜀汉政权的内部矛盾。可以说“诸葛之成规”,是蜀汉政权存续与兴盛的政治基础。

二、“诸葛之成规”被破坏后的弊端

建兴十二年,诸葛亮薨于五丈原,继任的蒋琬、费祎仍能萧规曹守,奉行“诸葛之成规”。蒋琬在迁大将军后,引费祎为尚书令共同辅政,仍以董允为侍中统领宫中政事、宿卫,“十三年,拜尚书令蒋琬为大将军,领益州刺史;以费祎为尚书令”,“侍中董允兼虎贲中郎将,统宿卫兵”。^{③⑨}从费祎任尚书令后,蒋琬仍以大将军录尚书事来看,蜀汉军政仍然总于蒋琬,与诸葛亮时期的体制相同。

延熙元年(238),蒋琬因北伐事宜,出镇汉中,并加大司马,开府。蒋琬出镇汉中后,成都政事委任于尚书令费祎,宫中委任于侍中董允,仍遵守诸葛之成规。延熙六年,蒋琬镇涪,因疾病缠身,故将大将军、录尚书事让于费祎,“琬自汉中还涪,祎迁大将军,录尚书事”^{④①}。第二年,又将益州刺史让给费祎,延熙九年,蒋琬、董允病逝,蜀汉政事转由费祎主持,直至延熙十六年费祎被刺。费祎主政期间,除因王平病逝,短暂出镇汉中外,基本都在成都理政。其不在成都时,蜀汉政事亦决之于费祎,“十一年,出住汉中。自琬及祎,虽自身在外,庆赏刑威,皆遥先谘断,然后乃行,其推任如此”^{④②}。由于蒋琬、费祎、董允等遵承“诸葛之成规”,推贤进士,为政“心平”,蜀汉政治因之得以不堕,《华阳国志》称“(蒋)琬心无适莫。是以上下辑睦,归仰于琬,蜀犹称治”^{④③}。又“(董)允加辅国将军,守尚书令。允立朝,正色处中,上则匡主,下帅群司”^{④④}。《三国志·蜀书·费

祎传》:“祎当国功名,略与琬比。”^{④⑤}以致蜀人有“四相”“四英”之称^{④⑥}。

蒋琬、董允病逝后,虽由费祎辅政,但蜀汉政治却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以士人控制宫中的制度开始瓦解。“琬卒,祎乃自摄国事。”^{④⑦}后主“自摄国事”后,蜀汉政治的变化首先发生于宫中,宦官黄皓开始干涉政事。陈寿虽将“宦人黄皓始专政”系于景耀元年^{④⑧},但从记载来看,黄皓干涉朝政实早于此,应当在董允病逝之后不久,“陈祗代(董)允为侍中,与黄皓互相表里,皓始预政事”^{④⑨}。另据《三国志·蜀书·刘永传》:“刘永字公寿,先主子,后主庶弟也。”“初,永憎宦人黄皓,皓既信任用事,潜构永于后主,后主稍疏外永,至不得朝见者十余年。”^{④⑩}蜀汉亡于景耀六年(263),据“后主稍疏外(刘)永,至不得朝见者十余年”则知黄皓“信任用事”当有十余年之久,最晚不迟于延熙十五年,此可视为黄皓干政始于董允死后不久的旁证。费祎死后,黄皓更无忌惮,加之后主刘禅信任,此后的侍中、尚书令多与黄皓朋比为奸、不能匡正,《三国志·蜀书·陈祗传》:“吕又卒,祗又以侍中守尚书令。”“祗上承主指,下接阉竖,深见信爱,权重于维。”^{⑤①}“宦人黄皓窃弄机柄,咸共将护,无能匡矫。”^{⑤②}诸葛亮时期以士人统领宫廷,限制宦官的制度,至此崩溃。宦官黄皓凭借后主刘禅的宠信,一跃而于侍中之前,统摄宫中政事,并以此号令尚书,这正与王鸣盛所言相同:“要之,士人必不如宦人之尤亲密。”“官不论贵贱,惟视其职之闲要,而闲要惟视时主之意向。”^{⑤③}

后主“自摄国事”后的另一个变化是,外戚、东宫旧臣开始在蜀汉政治之中发挥重要作用,“诸葛之成规”在选举层面上“选贤与能”的要求也逐步被打破,出任要职并非仅由才德,而且还要视亲近与否。自董允病逝后,蜀汉侍中先后为陈祗、诸葛瞻、樊建、张绍,而其中诸葛瞻、张绍均为外戚。诸葛瞻十七岁尚公主,“拜骑都尉。其明年为羽林中郎将,屡迁射声校尉、侍中、尚书仆射,加军师将军”^{⑤④}。张绍为张飞次子,后主刘禅张皇后之兄,“官至侍中尚书仆射”^{⑤⑤}。如此则宫中之权从士人转至宦官、外戚之手。刘禅不仅以诸葛瞻为侍中,之后还以其为卫将军平尚书事辅政,“景耀四年,为行都护卫将军,与辅国大将军南乡侯董厥并平尚书事”^{⑤⑥}。又《华阳国志》:“拜丞相亮子武乡侯瞻中都护、卫将军;迁董厥辅国大将军,与瞻辅政。”^{⑤⑦}诸葛瞻辅政时,方

35岁。

后主刘禅不仅亲近宦官外戚,对于东宫旧臣也是信任有加,《三国志·蜀书·来敏传》:“敏荆楚名族,东宫旧臣,特加优待。”^{⑤7}来敏屡屡挑起新人、旧人矛盾,诸葛亮以为:“来敏乱群,过于孔文举”,故对其加以贬黜。^{⑤8}但当诸葛亮死后,刘禅以来敏为“荆楚名族,东宫旧臣”,故数次使其“废而复起”。刘禅对东宫旧臣的亲近,于此可见一斑。

蜀汉军事布局主要在于三个方面:以汉中为中心防卫曹魏、进而北伐;以永安、江州为中心,防备孙吴;以庾隆都督为中心,统领南中。刘禅统治后期,永安都督与庾隆都督均由东宫旧臣统领。如“以襄阳罗宪为领军,督永安事”^{⑤9}。刘禅不仅以罗宪镇守永安,还以东宫旧臣霍弋统领南中,“子弋,字绍先,先主末年为太子舍人”,“后为参军庾隆屯副贰都督”,“领建宁太守,还统南郡事”。^{⑥0}刘禅信任东宫旧臣,东宫旧臣也对刘禅忠心不二,如霍弋就以死效忠,据《汉晋春秋》记载:“霍弋闻魏军来,弋欲赴成都,后主以备敌既定,不听。及成都守,弋素服号哭,大临三日。诸将咸劝宜速降,弋曰:‘今道路隔塞,未详主之安危,大故去就,不可苟也。若主上与魏和,见遇以礼,则保境而降,不晚也。若万一危辱,吾将以死拒之,何论迟速邪!’”^{⑥1}

随着“诸葛之成规”被逐渐放弃,蜀汉政权以往的政治平衡也渐渐被打破,随之,各种弊端开始暴露。宦官、外戚何以为民蠹,王夫之于《读通鉴论·三国》中曾有讨论:“乃昏主则曰:外戚宦官,内侍禁罔,未尝与民相接,恶从而朘削之?”“纨袴之子,刑余之人,知谀而已,知贿而已;非谀弗官也,非贿弗谀也,非剥民之肤弗贿也,则毒流四海,填委沟壑,而困穷之民无所控告。”^{⑥2}当黄皓秉权之后,“选贤与能”的用人标准便逐渐被放弃,《襄阳记》:“时黄皓预政,众多附之。”^{⑥3}由于众多附之,至景耀五年,黄皓的势力已是“枝附叶连”^{⑥4}。依附黄皓者进用,不附黄皓者贬黜,罗宪因“黄皓预政,众多附之,宪独不与同,皓恚”,虽亲近如东宫旧臣亦“左迁巴东太守”。郤正因不附黄皓,而官不得调,“自在内职,与宦人黄皓比屋周旋,经三十年。皓从微至贵,操弄威权,正既不为皓所爱,亦不为皓所憎,是以官不过六百石”^{⑥5}。不仅罗宪、郤正等为黄皓所抑,大将军姜维亦处于忧患之中,“而宦官黄皓等弄权于内,右大将军阎宇与皓协比,而皓阴欲废维树宇。维亦疑之。

故自危惧,不复还成都”^{⑥6}。而谋废姜维的,不仅为宦官黄皓,还有外戚诸葛瞻,裴松之注引孙盛《异同记》:“瞻、厥等以维好战无功,国内疲弊,宜表后主,召还为益州刺史,夺其兵权;蜀長老犹有瞻表以阎宇代维故事。”^{⑥7}

刘禅任用宦官、外戚、东宫旧臣,势必挤压士人的仕进空间与升迁途径;黄皓专擅选举、党徒枝附叶连,使得贤才不进,小人在位。如此则政以贿成,蜀汉政治因之大坏,故吴人贺邵认为蜀汉灭亡在于不任贤才,专信小人,“近刘氏据三关之险,守重山之固,可谓金城石室,万世之业,任授失贤,一朝丧没,君臣系颈,共为羈仆。此当世之明鉴,目前之炯戒也”^{⑥8}。吴人陆凯以为蜀汉灭亡在于“赏罚失所”、政刑乖错:“而刘氏与夺乖错,赏罚失所,君恣意于奢侈,民力竭于不急,是以为晋所伐,君臣见虏。”^{⑥9}其二人所言虽各有偏重,但参以王夫之所论,则可视为一贯。正是由于蜀汉政权赖以生存的政治根基——“诸葛之成规”被破坏殆尽,所以,蜀汉之亡亦可计日而待了。

三、蜀汉倾覆

对于蜀汉倾覆的原因,自汉代以来大多将之归罪于谯周劝降,而王鸣盛则注意到郤正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他在《十七史商榷》“郤正造降书”条说:“《郤正传》:‘景耀六年,后主遣使请降于邓艾,其书(郤)正所造也。’陆游《筹笔驿》诗:‘一等人间管城子,不堪谯叟作降笺。’用意相形甚妙,但不知造降书者乃郤正,非谯周也。”^{⑦0}郤正是河南偃师人,祖父为灵帝时益州刺史郤俭,父亲郤揖为孟达营都督。^{⑦1}从地域角度看,其当属于东州士;从新、旧角度看,其在新人旧人之间;从阶级、气类看,则当为士人。以谯周劝降,郤正作降书而言,蜀汉倾覆不仅应归罪蜀人,东州士似也难以逃责。

全面考察蜀汉灭亡的过程,可以发现,姜维也难辞其咎。孙盛于《晋阳秋》中论姜维道:“既辱且危,死其将至,其姜维之谓乎!邓艾之入江油,士众鲜少,维进不能奋节于绵竹之下,退不能总帅五将,拥卫蜀主。”^{⑦2}对此,裴松之为姜维辩解道:“但邓艾诡道傍出,出于其后,诸葛瞻既败,成都自溃。若维回军救内,则会乘其背。当时之势,焉得两济?”^{⑦3}参之《三国志》《华阳国志》可知,姜维不救援成都并非因“当时之势”不得两济,而是另有所图。《三国志·

蜀书·姜维传》：“而邓艾自阴平由景谷道傍入，遂破诸葛瞻于绵竹。”“维等初闻瞻破”，“于是引军由广汉、郾道以审虚实”。^⑭从姜维听闻诸葛瞻军败之后，尚能“引军由广汉、郾道以审虚实”，可知姜维并非为钟会所困不得动弹。从姜维引军入广汉、郾道的举动则可知其另有所图。^⑮由剑阁至成都的路线，可以建安十七年刘备由葭萌关进取成都的路线作为参照。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刘备由葭萌关进军成都的路线是：由涪城，而后至绵竹，再而后进军雒，最终包围成都。^⑯姜维本就在剑阁，其不从涪直驱绵竹驰援成都，而是转兵向东进入广汉。如此行军，恐怕不仅仅是为了“以审虚实”，而是另有所图。姜维所图者，为常璩一语点破：“姜维未知后主降，谓且固城；素与执政者不平，欲使其知卫敌之难，而后逞志；乃回由巴西，出郾、五城。”^⑰常璩认为姜维如此行军的目的在于养敌自重。姜维既知成都城防坚固、守备无虞，便料定邓艾难破成都，故姜维乘此时机，放手使邓艾进攻成都，令当政者知“卫敌之难”。待时机成熟后，姜维再挥兵成都，击破邓艾、解成都之围，以此提高威望，进而统领蜀汉政治。不料，此时谯周劝降，郤正作表，成都不战而降。姜维虽不是主观上想使蜀汉灭亡，但其与“执政”间的矛盾，却阴差阳错的导致了蜀汉政权灭亡。姜维，天水冀人，“少孤，与母居”，降蜀后为诸葛亮所赏识，称其为“凉州上士”，钟会也认为其不减“公休、太初”。^⑱从地域论，姜维不为益州士人；从新旧论，则当属新人；从气类论，为士人无疑。如此则蜀汉灭亡不仅与旧人有关，新人也难辞其咎。

谯周、郤正、姜维无论是出于主观目的，还是由于阴差阳错，都因与执政者的矛盾造成了蜀汉政权的灭亡。而矛盾的根源则在于，蜀汉政权放弃“诸葛之成规”后，后主宠信宦官，信任外戚、东宫旧臣，使得士人仕进之路受到阻塞，以致士人寒心，贤者不复在位，政治因之紊乱，使得蜀人丧气。吴人薛莹出使蜀汉后，对孙休言蜀汉政治道：“主闇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臣闻燕雀处堂，子母相乐，自以为安也，突决栋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祸之将及，其是之谓乎！”^⑲政治基础不在，当强敌来犯，自然矛盾丛生，最终导致其迅速灭亡。

通观蜀汉兴衰，可以看到其兴盛是由于刘备、诸葛亮承接东汉中期以后士人的政治理想，排除宦官、

外戚，进用贤能，构建了一种区别于东汉的政治模式，即“诸葛之成规”。当诸葛亮、蒋琬、董允、费祎相继离世后，“诸葛之成规”渐渐被后主所抛弃，蜀汉政治又回归到了东汉中后期的故辙之上，最终丧失了士人与益州百姓的支持，走向覆灭。杨鸿年曾写道：“东汉既有中常侍，西蜀当然也就设了。正因为这样，所以亡东汉的是中常侍，亡西蜀的也是中常侍。弊政不除，旧祸重演，实为可叹。”^⑳中常侍为东汉后期士人所切齿的对象，陈寿也以黄皓为中常侍之年作为其专政之始。要之，中常侍其实是东汉中后期政治模式的一种标志，其再次出现可视作蜀汉政治的一大转变，从这个角度来看，陈寿、杨氏所论不为不中。

注释

- ①尹韵公：《谈蜀国灭亡的原因》，《文史哲》1982年第5期。蒋福亚：《黄皓杂议》，《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6期。王瑰：《信心丧失与知识忠诚——从谯周生平看蜀汉灭亡原因兼驳地域势力集团矛盾亡国说》，《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李万生：《礼秩与国运——蜀汉亡国原因探讨之一》，《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②王仲幸：《魏晋南北朝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7页。尹韵公：《谈蜀国灭亡的原因》。李开元：《浅谈蜀汉统治集团的社会构成》，《文史知识》1985年第6期。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世纪出版集团，2002年，第133—136页。雷近芳：《试论蜀汉统治集团的地域构成及其矛盾》，《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田余庆：《李严兴废与诸葛亮用人》，《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2011年，第190—207页。杨世见：《刘备与蜀汉政权的兴衰》，《川东学刊》（高等研究专号）1997年第4期。罗开玉：《三国蜀汉士著豪族初论》，《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6期，第1—9页。朱子彦：《诸葛亮接班人与蜀汉政权存亡》，《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10期。白杨、黄朴民：《论蜀汉政权的政治分化》，《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4期。③⑦⑨⑩⑪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第987、919、918、1010、1057、1057、1004、985—986、986、1011、1014、934、920、1061、1062、1062、899、987、907、987、933、932、944、932、1025、1007—1008、1008、1008、1034、1065、933、1459、1401、1034、1068、1068、1066—1067、881—882、1062—1067、2255页。④⑫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常璩：《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第582、552—553、547、565、569、573、573、589、585、589、594页。⑤蒋福亚：《黄皓杂议》，《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6期。白杨、黄朴民：《论蜀汉政权的政治分化》，《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4期。⑥赵昆生：《〈出师表〉与蜀汉政治》，《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⑧王鸣盛：《十七史商榷》，2005年，上海书店出版社，第296—297页。对于“府中”，历代学者看法不一，大致有两说：一种认为府中指公府，另一种认为指诸官府。以“府中”为公府的说法，最早出现于《文选》六臣注，为以后学者所

宗;而以“府中”为诸官府的说法出于清人赵绍祖。从出现时代而言,第一种观点更近于古或有所本,似胜于后者。说见陈寿著,卢弼集解:《三国志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462页。又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二府三府四府五府”条中考两汉时期“府”之所指,认为多指公府,可从,说见《十七史商榷》卷二三《汉书十七》,第165—167页。^{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1472、1472、2251、367、1763、2111、2525、2521、1472、2076页。^⑬汉代宫廷之中又有省中,省中即禁中,其由宦官宿卫,不同于宫中宿卫。杨鸿年:《汉魏制度丛考》,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3页。^{⑰⑱⑲}司马彪:《续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3579、3574、3594页。^㉑士族作为一个阶级,萌芽于东汉,发展于三国,形成于西晋。汉末三国时期,士族正处于发展期,其界限不像东晋南朝时期那样严格以阀阅为断。出身贫贱者而为士人,甚至名士者往往有之。从名士以“刻情修容,依倚道术,以就其声价”为标准来看,其时以乡论、才能、气类为标准决定其人是否为士人。参见唐长孺:《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士族的形成与升降》,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2011年,第25—63页。^㉔徐冲:《“汉魏革命”再研究:君臣关系与历史书写》,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21—48页。以下追溯东汉士人欲取代宦官在宫中、禁中地位的观

点,多参考徐冲的观点。^㉕余华青:《中国宦官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6—168页。^{④⑥}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第898页。把梦阳亦认为,自诸葛亮薨后,诸葛系权臣控制蜀汉政局的体制开始瓦解,后主开始利用宦官、陈祗控制朝政。见把梦阳:《录尚书事与蜀汉政局》,《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⑤⑦}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260、301—302页。^⑧田余庆:《李严兴废与诸葛用人》,收入《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2011年,第204页。^⑩王夫之:《读通鉴论》,中华书局,1975年,第303页。^⑲任乃强也曾对此有所怀疑,其推测姜维如此行军的目的在于防御钟会,但其论述恐难以成立。任先生认为姜维从剑阁撤军的原因是:恐钟会统军绕过剑阁,前后受敌;故以退为进,退至广汉迎击钟会。此说难以成立,首先从史料来看,钟会并不知绕过至剑阁的道路。其次,姜维凭剑阁雄关尚不能破钟会,失此雄关,其何能为?故姜维退至广汉迎击钟会的说法,于理不合。任先生的论述缺乏文献依据,多出推测。因此,当以《华阳国志》的记载为依凭。任乃强先生的观点见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27页。^⑳杨鸿年:《汉魏制度丛考》,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1页。

责任编辑:王 轲

The Prosperity and Perish Of Shu Han with Policies Of Zhuge Liang

Zhang Zhongyin Zhang Xuhua

Abstract: The rules made by Zhuge Liang were not only the basic national policy, but also the political basis for Shu Han Kingdom to maintain its reign. The core connotation of the rules was that intellectuals replaced eunuchs and royal relatives to govern the central and local administrations. The ideological origin of the rules came from both the political thoughts of the intellectuals who lived in the middle and late Eastern Han Dynasty, and Liu bei and Zhuge Liang's reflections on the politics of the late Eastern Han Dynasty. After the successive deaths of Zhuge Liang, Jiang Wan, Dong Yun and Fei Yi, Liu Shan gradually gave up the rules, instead, he appointed eunuchs, relatives and his former subjects to govern the nation, which undermined the political basis for maintaining Shu Han Kingdom and finally resulted in its own perish.

Key words: rules made by Zhuge Liang; Shu Han Kingdom; Gong Zhong and Fu Zhong (the central and local administrations)